罗季奥诺夫:俄式生活,中式回声

汉学家罗季奥诺夫

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?”这是个争了千百年的“公案”。

相应地,老聃西去何去,也是个困扰至今的“疑案”。

老子李耳周守藏室之史,稳当当居庙堂之巅,却孤零零骑青牛,渺茫茫隐流沙,不知所终,意欲何往?

外国文人热衷这个:布莱希特写诗,写“老子流亡”,拿东方古圣先贤自明心志;卡夫卡枕边就躺着一本《道德经》,将“无用”与“道”的秘密写进《中国长城建造时》。

“既然无人确知他的终点,我们不妨猜想,他来到了俄罗斯。”俄罗斯汉学家、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罗季奥诺夫打趣道,“我们自然是热烈欢迎的。”

在他眼里,无论“老子西去”抑或是“浮屠东来”,本质上都是文明在流动中完成的自我超越与相互成全。

“人们一般只有一种生活方式,而我有两种:一种是俄式,一种是中式。特别是随着中文学习的深入、所读书籍的增多,我越来越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。”

罗季奥诺夫坦言,思想的迁徙没有护照,它的终点,取决于何处的心灵为之敞开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子扬/文
顾炜/摄 钱念秋/视频

罗季奥诺夫

汉学家、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。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,翻译了老舍、贾平凹、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,策划出版了《边城文集》《白雪乌鸦》《第四十三页文集》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译文集,获第十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。

扫码看视频

大读家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“俄罗斯知识分子书架上必有《道德经》”

“老子过函谷去了俄罗斯。”乍听之下是一个幽默玩笑,但琢磨一下,却颇有“玩味”。毕竟,无论是“老子”或“道德经”,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都不陌生:

在文坛,托尔斯泰倾力推荐,并言明老子学说对自己影响巨大,“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儒家和老子著作的缘故”;在政坛,俄罗斯政要多有引述《道德经》,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”“使我介然有知,行于大道,唯施是畏”等名言,出现在国际舞台上;在乐坛,似乎也能望见老子与《道德经》的影响力,此前俄罗斯殿堂级艺术团体马林斯基剧院巡演,歌唱家随口就吟出老子的名言;至于学界,这种追随则更为深邃绵长。

从沙俄时代汉学开山,到苏联时期学者们试图用辩证法与“道”对话,再到当代,人们挣脱了单一范式的束缚,以更为多元、鲜活的姿态重新拥抱老子,一代代俄罗斯顶尖的头脑,都将老子思想视为解读东方智慧的核心密钥。

“我估计,差不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里,书架上肯定会有《道德经》,而且不同版本的译文也有很多。”罗季奥诺夫表示,这本古典名著在俄罗斯有着大量读者,老子的哲理和想法也被俄罗斯人广泛接受。

如果说对《道德经》的认同,更多是基于对一种先知智慧的沉思,那么,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接纳,则是一场关于苦难、激情、人性与变革的,更具象也更炙热的精神对话。

罗季奥诺夫饶有兴趣地谈起,上世纪五十年代,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等作家的作品,曾被大量引进俄罗斯。

“鲁迅是俄罗斯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,总发行量逾146万册,这个数字背后是几代俄罗斯读者通过《阿Q正传》对‘国民性’的会心共鸣。茅盾亦然。迄今为止,茅盾作品的俄文版,已发行70万册。”

“还有,我特别喜欢老舍先生的小说,一方面是他的文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,另一方面是他字里行间的幽默感,能让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世界。这个风格,可能在那一代中国作家中是独一份儿的。”

罗季奥诺夫说汉语,有时会冒出一两个“儿化音”,这也让人们疑心,他是从哪里学会的“京腔”。事实上,他既未在北京久居过,也没有刻意模仿过,“我曾经翻译过《我这一辈子》,没准这个‘口音’就是老舍先生带给我的。”他笑称。

当然,并非所有中国故事都能如此顺利地“落地”,这里面还存在着很有意思的“误读”。

“比如‘潘金莲’。这个名字在中国人尽皆知,但在国外,‘潘金莲’的概念并不流传,因此,法国人看她的形象可能就像‘包法利夫人’,俄罗斯人去看,可能应该是‘安娜·卡列尼娜’那样的人物。”

一部作品或思想在远离故土的旅程中,往往会在异乡人的心灵里被赋予第二次鲜活生命。

“文学是深入观察和了解一国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,是关于人的学问,我们都是人类,有着人类共通的情感。所以,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更好地了解彼此。”

这位致力于让彼此了解的人,其故事本身,就是一次漫长的跋涉,从望见江河对岸的灯火开始。

“东北人”的两种生活

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罗季奥诺夫和那个时代很多俄罗斯孩子一样,读着高尔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长大,也曾在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字里行间,读到过“远东”和“边境”,这些词汇一如保尔·柯察金所铺设的铁路,将他少年时代的想象,引向一片比第聂伯河涛声更加缥缈、名为“东方”的远方。

但与大多数只能通过书本词汇遐想的同龄人不同,罗季奥诺夫对那个“东方”的感知,却拥有一个坚实得多的起点。

“我与中国的结缘可谓‘命中注定’!”罗季奥诺夫说,他出生的地方,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,与黑龙江黑河市仅一江之隔。“在我的童年岁月,家乡的人们只知道对岸是中国,其他的一无所知。虽然很近,但其实像月亮一样远。”

罗季奥诺夫经常开玩笑,称自己是“东北人”。

在汉语里,“东北人”不光是一种地理上的划分,它也代表了一类人极为鲜明的特质:幽默达观、坚韧直爽、乡土情深,待人处事有股热乎气儿。

事实上,生活中的罗季奥诺夫也是如此。

所谓“坚韧直爽”,是他身上有股认准了道儿就走到底的劲头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“当时中文系是所有外语系中最难考的”,但他凭借少年时的一腔热爱考入中文系,而后又远赴复旦大学进修。

“与中国的邂逅没有让我失望。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后,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打开。”

所谓“幽默达观”,则让他的一切认真显得可亲。初次见面,他便指着下榻房间打趣,庭中天井,牖中窥日,活像个迷宫;他整理衣衫,赶忙抽出一条领带,“采访得注意仪表,不能显得刚从床上爬起来。”

当然,最大的妙语还是那句:“既然老子要西行,我代表俄罗斯人欢迎你。”

而所谓“热乎气儿”,是他融入中国文化最生动、最烟火气的一炉火。罗季奥诺夫每次到中国,吃遍八方食事,都是必选项。在南京斩盐水鸭,到无锡啃酱排骨,他还翻译出版过崔岱远的《吃货辞典》,专门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中国饮食文化。

当然他最钟情的还是饺子。不光是口味,他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氛围。

这些“东北人”的特质,若单独看来,或许只是有趣的个性。但当它们同时汇聚于一个生于黑龙江畔、学于黄浦江边、居于涅瓦河岸,毕生耕耘于中俄文字之间的人身上时,便不再是巧合——

三十年如一日,自博士论文研究老舍开始,他便致力于将中国文学渡往俄语世界,至今已翻译老舍、贾平凹、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30部,策划出版了《边城文集》《第四十三页文集》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译文集。

当初翻译小说《白雪乌鸦》,他曾登门拜访迟子建,三赴哈尔滨于旧街巷中印证文字;担纲话剧《蛙》的文学顾问,与莫言切磋“吃透”的译事妙论,笑言:“何止于吃,更当有喝——喝透、啃透!”

刘震云访俄,他全方位策划、推广,并参加了各项活动,“我交情最密切的中国作家是刘震云先生,以‘老乡’相称,当然这里的‘乡’指的是‘梦乡’。”

“文化独特、历史悠久、幅员辽阔,这些因素让中国文学别具魅力。而作为世界一流的文学,中国文学也应该被更多人知晓和了解。”让一种文明的深沉心事,在另一种语言里获得准确而悠长的回声,罗季奥诺夫说,他便是那接续对话的人。

旧歌谣,新对话

事实上,这两年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,俄罗斯文艺正逐渐变成新的“流量密码”。

关键,这里面大部分的受众还并非中老年人,而是一群90后、00后为主的年轻人。

以音乐为例。俄罗斯民谣,如柳拜乐队的音乐,已经成了各大短视频“御用”的背景音乐,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;俄罗斯摇滚,如前几年为纪念“俄罗斯摇滚教父”维克多·崔的演唱会,被搬运到中国视频网站,吸引了数十万网友围观;更别说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插曲,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红莓花儿开》《歌唱动荡的青春》……弹幕飘满“乌拉”。

在罗季奥诺夫看来,这样的文化交流充满奇趣,亦乐见中国年轻网友在旧旋律里打捞新的热情,但他也表达了隐隐的“忧虑”:

“俄罗斯是文化大国,成就颇丰,可是我们走出去的‘国际名牌’,主要依靠以前的,尤其是19世纪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。尽管当代的俄罗斯也有很多水平很高的文艺作品,但翻译成中文或其他语言,并没有得到想象中那么广泛的认同和欢迎。”

罗季奥诺夫认为,俄罗斯文化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,“我相信,我们会在后续转变中找到独特的价值、新颖的观念,可以让中国的朋友重拾对俄罗斯文化的热情。”他说,“迫切需要找到我们能一起唱的‘新歌’。”

“新歌”从何处起调?旋律或许正从反向传来。当中国年轻人在赛博世界里打捞俄罗斯的旋律时,俄罗斯的年轻人正一头扎进中国的方块字森林。一个更惊人的现象正在发生:

2024年,俄罗斯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了150本。此前中国网络文学的头部作品在俄译本销量已突破百万册大关。这个数字,超过了中国严肃文学在俄三十年销量的总和。

“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时尚和爱好进入俄罗斯年轻人的世界。不仅仅是文化猎奇,这背后有共鸣。”罗季奥诺夫分析,网络小说关于“修仙”与“宫斗”的东方幻想,恰恰给了俄罗斯读者应对现实难题的某种答案或慰藉。

更有趣的延伸是,已有俄罗斯青年,开始用中式笔名,模仿中国网文写作。文学的流动,在此刻完成了奇妙的回环:从古典的“道”,到当代的“修仙”,一种文明最深邃与最流行的部分,正在同时被另一种文明咀嚼、消化,乃至再生产。

“网络文学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。他们会长大,会成为促进国与国之间交往的‘鲜活力量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网络文学‘出海’能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产生积极而长远的影响。”罗季奥诺夫说,对此,他有信心。

圣彼得堡的书店里,修仙网文与《老舍文集》被并列摆放在“中国文学”的显眼柜面;而算法的河流之上,东来的旋律与西去的字节,正完成一场寂静而盛大的对流。

25年前,还是学生的罗季奥诺夫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:“老舍,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,帮助着中国读者探索自己心灵的奥秘,也使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同一天空之下的人民。”

这句话,如今读来不像结论,倒像是预言:

当一种文明的灯火,能在另一种文明的瞳孔中,映出自己清晰的倒影,未来便已到站。